

感动与敬意

——在“新闻与文学的关系——曾敏之创作谈”研讨会上的发言

朱双一

摘要: 1939 年桂林《救亡日报》上曾敏之的四篇佚文,各属不同类型,但有一个共同的主旨,即强调文艺与抗战的紧密结合,反对“与抗战无关”的创作倾向。曾敏之是当时文学青年的一个典型,从他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当时文学的时代主潮。“文以载道”、文艺为政治服务(当时最大的政治是抗战)等观念,现在可能颇受某些人的诟病,但在当时,却是每一位有血性、有良知的中国作家的必然选择。此后漫长岁月中,曾敏之持之以恒的文艺观以及创作上的特点,在上述四篇文章中已见明显苗头。这些文章文笔简练清新,干净利索,没有“五四”以来常见的欧化毛病。

关键词: 曾敏之;佚文;文艺观及创作特点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63(2011)3—0010—03

DOI 编码: 10.3969/j.issn.1008—0163.2011.03.006

今天参加“新闻与文学的关系——曾敏之创作谈”研讨会,内心非常感动,这感动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当然是来自曾老。曾老的人生有点曲折坎坷,但十分丰富多彩,丰富中有个不变

的轴心,那就是“爱国”。曾老身上有种刚正不阿、坚忍不拔的风骨,认定一个真理,就永远朝着这个方向追求的气质,曾老以他那一以贯之的报国热忱,让我们感动。

一条河流归至大海,中间要经历多少风波、激流险阻……才达到最后的归宿。我的经历对人生一条河引起共鸣,但却侥幸漂流过来了,所以未沉落、灭顶,是由于看到正确的航标指向。对时代、对历史、对国家应尽的一份责任,虽然学养、才力不足以适应,但却以良知加以承担。”他感谢大家对于他人生历程的全程审视,并当场赋诗抒怀:“感戴群贤勸勉意,笔投尘海为苍生!”

最后,饶子教授做了总结发言,她认为《曾敏之评传》一书的出版和“新闻与文学的关系——曾敏之创作谈”研讨会的召开,既是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喜事,也是暨南大学文学学院的盛事。她指出此次会议具有四点明显的特

色。她说:“参加会议的有作传的人与传主,还有与传主不同时期有过近距离接触的朋友、同事和学生,大家在一起共同参加书的研讨。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写传人要有勇气,传主本身有深厚的内涵。通过多方面的对话,多角度、多层次的投射,我相信对于将要再版的《评传》繁体字版将会有促进的。”她指出,这是个“五代同堂”的研讨会,丰富而又独特,而与曾老相会,是福气也是缘分,相信每个参会者都会有所触动。这个会议对于世界华文学学科将来的发展,也必将有所启迪。

作者李培培,女,暨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感动的另一方面,则是写出了《曾敏之评传》的陆士清老师,虽然已经退休了,但老骥伏枥,写出了这样高质量的煌煌巨著。我们知道,写这样一本书,是非常不容易的,陆老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真是我们后学们学习的榜样。陆老师这本书,抓住了曾老是记者兼作家的双重身份这么一个特点,将曾老的个人命运与时代、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曾老生长于战乱时代,却也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么一个关键的、转折的伟大时代,陆老师在书中有对时局走向的深入分析,如对抗战胜利后两党和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分析,非常透彻,这样就能凸显曾老在当时的立场和选择的正确,所以读了评传,不仅了解了曾老的九十多年的人生道路,也等于上了一门生动的中国现代史的课。这本评传抓住了曾老的“报国素志”这么一个主轴,等于抓住了传主的灵魂,整本书也就有了灵魂,这是这本书成功的关键所在。

今天我想借陆老师这股东风,介绍曾老在70多年前(也就是1939年4月至7月间)发表于桂林《救亡日报》的四篇佚文。这几篇文章,我在十多年前就找到了,一直想多找一些,然后写一篇文章,后因工作忙而搁下了。感谢陆老师的书,让我认识到这几篇佚文颇有意思,或者说颇为重要,所以在这里做个介绍,以这种特殊方式,表达对曾老和陆教授的敬意。

这几篇文章的特殊意义,一是《救亡日报》其实是一份共产党的报纸,曾老当时就频频在上面发表文章,是否他在当时(1939年)就与共产党建立某种较紧密的联系?二是曾敏之后来创作的某些特点及其文学观念,在这些文章中已显露端倪,值得给予必要的关注。

第一篇《王老伯谈“春耕计划”——希望优待出征军人家属能普遍实行》是一篇通讯报道性质的文章,却是带有某些文学描写色彩的通讯报道。它有一些景色描写、人物刻画以及作者的心理波动的文字。如开头就是一段景色描写:“当春阳照着大地,晨风吹拂着阡陌上滴珠的青草时,我怀着一颗兴奋的心,冒着春寒,走向邻村王老伯家去。”陆士清教授在《曾敏之评传》中指出:曾老的《周恩来访问记》在文体上别

开生面,它不是一篇典型的一问一答的访问记,而是一篇文学价值很高的报告文学,采访过程中被访者的心情和表情,也被形象生动地加以描写,这一特点,在《救亡日报》上的这篇王老伯访问记中已可见其苗头。另外,这篇文章其实是以委婉的方式表达了对当时执政者的措施不落实、不到位的不满和批评。从陆老师的书中,可知当时曾敏之先生从亲身经历和感受,已发现抗战之所以困难重重、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形势危急,民众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无能与贪腐有一定的关系。这是后来曾敏之先生选择其人生道路的重要原因和伏笔。发出这种微辞是要冒着一定的危险的,所以可看出曾老的一种为真理而不畏艰险的风骨。在这篇对王老伯的访谈中,已可见其雏形。

第二篇的题目是《从“自勉勉人”想起》,它的主旨是在批评某些人在外敌入侵的危机时刻,还沉迷于个人的文艺小天地里的错误倾向。他写道:在当前,以血腥的现实作为创作题材,是谁也不容异议的事!却还有人在怀疑,甚至说人家是“抗战八股”,要求着“与抗战无关”的作品,由此进一步便兜回到了艺术至上论而掩盖掉了血腥的现实,这实无异间接服务于敌人之麻醉政策。这一种人,充其量只不过是学到了周作人;当然还没有法子学到他的渊博,而多半是学到了他的喝茶,但是,很明显,是会由喝茶走到饮弹去的。这里作者的语调诙谐幽默,却又一针见血,已带有鲁迅风。

可以看出,抗战初期的曾敏之,内心充满了抗日爱国的激情,抗战事业是他衡量一切的标准,他自己也愿意为了国家而与敌人血战到底,而在平时,则要用手中的健笔,为抗战服务。如果在国家危难之时躲入个人的文艺小天地中自我欣赏地作着“与抗战无关”的作品,这是曾敏之所无法接受的。

陆士清教授在《评传》一书中,曾对曾老充满忧国忧民之情的文艺观加以阐述。如指出曾老曾就聂华苓所说的“中国作家太过忧国忧民,以致所写的内容无法突破时空、国情,达到反映人类共性的极致……这是受‘文以载道’的影响”等语,指出“文以载道”是中国传统的文论,

中国现代作家自“五四”以来,就因国弱民困,备受帝国主义欺凌,所以长期以来反帝反封建成为文学的主要内容,即使1949年后,也还是如此,所以“忧国忧民”是中国知识分子迫于时代、形势所共有的情操。由此可见,强调文艺与现实、时代紧密相连,文艺为民族解放、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服务,反对作家吟风弄月,脱离现实人生,是曾敏之一以贯之的文艺观。

第三篇《读〈论二期抗战中救亡日报的使命〉》一文,则处理一个具体的事项:呼应恢复“文艺通讯员运动”的倡议。他写道:“我们知道在这充满着战斗血腥的艰苦时代里,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不知有着多少抗战的英雄故事,多少骇人的敌军兽行,多少悲惨的灾祸,多少失败和成功的教训,这一切活生生的素材,它可供有创作素养的既成作家们创造伟大的民族作品,同时,它也可给一般的大众利用他所熟悉的方面,用泼辣和剽悍有力的通讯写作,以表现出‘伟大的民族作品’未出现之前而所含有的教育及表现民众的战斗精神,还是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的!而文艺通讯网的主要任务及其意义就是建立在这不可忽视的价值上!”文章在最后概括了作者的基本观点:“重新建立更坚强更切实的文艺通讯网!汇合我们的铁笔去打击敌人!改造自己!”由此可知,在对待建立文艺通讯网这一具体事项上,仍充分体现出曾敏之的文艺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基本文艺观。

第四篇《今日的诗与诗的明日》更近于一篇诗论。有人说中国的诗歌二十年来没有一些成就。对此曾敏之不能苟同,他认为除非以现代派诗作为标准来衡量,否则是不能这样“一笔抹煞”诗歌的成就的。抗战以来诗的战绩,固然弱于文学艺术的其他部门,但不能以此否定它已建立了的斗争艺术的基础。该文的重心在于以天蓝的《队长骑马去了》为例,说明尽管当时的诗歌创作还存在着许多缺点和不足,但是“诗人们假如渗透了血腥的现实,不忘记站在大众斗争的行列中,提炼大众语言的运用,到实际斗争经验去吸取试验所得的教训,这些缺点一点儿也不难克服”。这首诗“刻绘了中国军人英勇大无畏的精神,刻绘了抗争中典型的英雄的性格;

这些英勇精神和典型的性格,在争取民族解放战争之今天,是中国的战士们所普遍地具备的”。最后,曾敏之展望中国新诗的未来,相信“在那些亲自投入抗争烽火中的诗人的手中,中国新诗将迎来光辉的明天”。

1939年桂林《救亡日报》上曾敏之的上述四篇佚文,各属不同类型,但有一个共同的主旨,即强调文艺与抗战的紧密结合,反对“与抗战无关”的创作倾向。曾敏之是当时文学青年的一个典型,从他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当时文学的时代主潮。“文以载道”、文艺为政治服务(当时最大的政治是抗战)等观念,现在可能颇受某些人的诟病,但在当时,却是每一位有血性、有良知的中国作家的必然选择。此后漫长岁月中,曾敏之持之以恒的文艺观以及创作上的特点,在上述四篇文章中已见明显苗头。这些文章文笔简练清新,干净利索,没有“五四”以来常见的欧化毛病。当时尚年轻的曾敏之就有如此的思想高度和文学表现,不能不让人感到由衷的钦佩,感慨其文学创作的较高起点。这其中或许有其天赋的才气,相信更是后天努力的结果,最重要的,还是来自那份爱国的情感和执着。

无论是曾敏之早年的作品以及陆士清教授的新著,都让我想到:如果市面上充斥的是数不清的张爱玲的各种传记而没有像《曾敏之评传》这样的著作,如果我们用来作为莘莘学子教科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将抗战文学一概贬为口号式、概念化、“政治的工具”,好像只有张爱玲的作品才是描写了人性的具有美学价值或文学性的“杰作”,并使百万千万的中文学子都建立了这样的文学价值观,甚至仿学张爱玲作品中人物的人生观和生活情趣品味,那会不会是一种民族的精神阉割呢?万一再次面临外敌入侵的民族存亡时刻,还会不会有人写慷慨激昂、鼓舞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抗战诗歌呢?这是我所担忧的,也是我所认知的在今天重新回顾曾敏之先生一生经历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作者朱双一,男,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教授